



建安唐宋 文学考论

石云涛◎著



學苑出版社

建安唐宋文学考论

石云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唐宋文学考论/石云涛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
(学苑文丛)

ISBN 7-80060-095-5

I. 建… II. 石…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84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4.625 印张 30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 册 定价:30.00 元

前言

这本集子是我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二十余篇论文结集。屈指算来,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在学术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二十个年头了。这些论文大部分都发表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有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接受,有的则得到同道的支持或者进一步的探讨。收入这本书时,我不想在读过别人的文章后重写或修改自己的旧作,为了保持原貌,为了尊重别人的成就,也为了让读者知道我所作的工作曾为学术的进步作过铺路石,或者说一个台阶。有的文章作了修改,那是因为经过自己的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或者得到了新的材料。

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二十多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着“建安”、“盛唐”、“隆宋”三个文学时代,这跟自己的学术兴趣有关。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人的觉醒时代,短短二十余年,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涌现出一大批辉映时代的杰出人才,他们拯救乱世的政治功业和兴复学术的文化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历来受到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和不断的新的阐释。早在河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它就吸引了我的兴趣和注意力。《〈洛神赋〉的写作时间》一文是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曾受到学界前辈余冠英先生、徐公持先生和河南大学王宽行先生的推奖,发表后引起

了学界的重视,那是我踏上学术道路的开端。

从事唐代文学研究,我有几个重要的机缘,大学毕业后在许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分工教唐宋文学,是其一;1990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苏者聪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唐代文学,是其二;研究生毕业,我又有幸师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朱雷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博士学位,重点研读唐史,是其三。在苏师和朱师的严格督导下,我系统的接触了唐代历史和文学文献。当时漫长的似乎“茫无目的”的阅读是枯燥而艰苦的,没有老师严厉的目光和做毕业论文的压力,一般难坚持下去。但现在感到了那种阅读的无穷受益。我想告诫现在在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们,我的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对于学者来说,读书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事情可以由机器来操作了,但读书却不能由机器来代替。这种认识可能只是一个常识,但现在不少人却忽略了这个常识。我在这种阅读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硕士和史学博士的学业,并撰写了一批有关唐代文学和历史的学术论文,收入本书的是其中关于唐代文学的几篇。

隆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我最喜欢的是那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达人苏轼,我喜欢他的为人性格和处世态度,也喜欢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创作。本书中的三篇有关苏轼研究的论文是我学习宋代文学所取得的一点儿成绩。当然对于宋代文学我没有像对唐代文学那样下功夫。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这些年来我在学术上一直是沿着

传统的文史结合的路子走的,其他关于历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说,收入本书的论文大部分是考论性作品。“文史一家”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作为两个学科,历史学与文学研究无论性质上、还是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有明确区分的。我曾经跨过两个学科的门坎,接触到两个圈子的学者,我不断听到文史一家的议论,但也经常感受到彼此之间非我族类的心态。大多数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不太关心和留意对方的成果,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成绩。因此我认为“一家”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具有正确性。但文史之间在研究领域上确有交叉处,这种交叉可能比之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范围更大。在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如考证的方法。没有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文学史毕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历史学的研究,文学的研究就没有背景的分析,就变得无根而游移,就会虚泛而空洞。但这是从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的,不是说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去研究历史和文学。

我在研究问题和撰写论文时有意识地寻找文史研究的结合点,努力将两者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融会贯通。考证文学集团的成员,研究文学集团形成的过程和他们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分析一个作家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心态,考证一篇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这是文学问题,也是历史问题,而用考证的方法研究文学问题,又是历史的方法。通过作品的鉴赏说明当时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状况,作家的思想和性格,则是历史问

题,又是文学的方法。我希望这样做能探索一条与人不同而又有成效的学术路径,但这只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走传统的文史结合的路子,不少前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且不说先哲早就说过要“知人论世”,近人“六经皆史”的提出,启示我们像《诗经》中那些文学作品都是可以作为史料来解读的。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诗史互证历来受到史学界和文学界学者的推崇,程千帆先生用“考证与鉴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结出了硕果,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和《唐代科举与文学》诸书分明昭示了这种传统的学术方法的成效和旺盛的生命力。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还有不少,后人应该从前辈们的经验中获取教益和启示。我羡慕他们的成就和业迹,愿意尝试这种方法从事我的学术研究。

根据个人不成熟的体会,我认为采取文史结合的方法研究问题,首先是学术选题应该是跨文学和历史的课题。文史交叉处很多,有的问题很难说是文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反之亦然。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史料,历史记载又是文学史料的很多。但文史研究有不能互相联系的,不能勉强凑合。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能互相借鉴的,不是所有研究文学的方法都可以研究历史,也不是所有研究历史的方法都可以研究文学,有时互相借用可能造成穿凿误会和牵强附会,这方面前人也有过教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研究者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历史研究学者和文学研究学者的两方面的基本素养,缺一不可。

常听人说某某研究的问题太偏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缺点,

因为作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或研究尚不够深入的问题,对于学者来说尚且感到生疏,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就会感到更加陌生,那就是“偏”。对人们来说,学术问题太偏实际是符合一般学术规律的。在我的研究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学术上历来受人重视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的前人成果的课题,一般我不大想去碰它,我把这称之为“避实就虚”。像古代文学和古代史这样的传统学科,前人的研究已经有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成果积累,这是后来的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门坎,你必须跨越它,而这种跨越要求研究者要有超过前人的学识,或者有更充实的材料,而且必须了解前人的成果。仅仅调查别人的研究成果,就要花去大量的宝贵时间,然后才能知道还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余地,最糟糕的情况是经过一番爬罗剔抉,发现原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所以我写文章常常选取前人没有研究过或研究非常薄弱的领域进行,这样就没有或很少前人的成果横亘在面前,等于少翻了一座山。我不想在一个强手林立的角斗场竞技,这或许是怯懦的表现,但一张白纸容易写字,而一张写满字句的纸就难以写出清晰的字来。当我在1990至1991年作硕士论文《盛唐道教和诗歌》时,那时关于道教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有寥寥三两家,成果非常有限,不花多少时间便可浏览过来,节省了许多时间。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这方面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已经连篇累牍,如果现在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常常能发别人所未发,填补空白。当然这种避实就虚的方法也有其困难的一面,那就是要选取一个前人没有涉足或涉足较少的课题,那是必须在

大量阅读第一手材料之后才可能酝酿出一个题目来,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另外就是没有前人成果做铺垫,没有前人的方法作借鉴,从头做起,可能只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可能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还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漏洞和不足。但从学术价值上来说,发现问题也是一个贡献。一种开拓往往不是起始于行动,而仅仅是一种念头,一个设想,这种念头和设想可能是不成熟的,但却是可贵的。相比之下,如果再进一步做一点工作,那怕只是一个开端,它也会给别人提供一个台阶,一个启示。

当我在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上发表《唐后期有关方镇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一文时,专家评审的意见有“即小见大”之语。应该说这也是我做论文一向有意识的努力和追求,我不喜欢空泛的议论,但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也常常不满足于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我希望在具体问题考证的基础上生发开去,去触及、透视或解决比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本书中《邺下文士考》中考出数十名曾经活跃在邺城的文士,印证了钟嵘说的“盖将百计”的说法,而在另一篇有关的论文中则进一步探讨邺下文士集团形成的过程,他们与曹氏父子之间特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人事调整,他们在复杂的汉末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他们的命运,说明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考证王昌龄《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一诗的写作时间,进一步结合这首诗研究王昌龄这位重要诗人的思想和性格。调查了苏轼的咏物词篇数之后,进一步研究苏轼咏物词的美学价值和苏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所以收入本书的论文题目大都很具体,但敬请读者不要以为只是繁琐考证而已。

学无止境,在学术繁荣的今天,我愿意继续努力,与大家一道享受学术的春天的喜悦,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祖国文化繁盛的花园增添色彩。在这本书里,我向同志们汇报了自己的一点点成绩,同时也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恳切期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使我今后的书和论文写得更好。

目 录

古代边塞诗探源

——兼谈《诗经》中的战争诗	(1)
《洛神赋》的写作时间	(17)
邺中文士考	(24)
建安时期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与汉末政治斗争	(42)
怎样理解刘勰和钟嵘对曹氏兄弟的评价	(65)
论刘勰对建安文学的研究	(79)
从陶诗看陶渊明饮酒的原因	(96)
贞观诗风的嬗变	(103)
跋法藏《与义湘书》	(122)
王昌龄《宿灞上寄侍御玙弟》诗发微	
——兼谈王昌龄的思想和性格	(130)
道教文化与盛唐诗人	(147)
道教与盛唐有关神仙的诗	(172)
盛唐诗歌中的道教文化意蕴	(200)
关于岑参与道教	(214)
岑参道隐略论	(221)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238)
李白《草书歌行》诗的真伪问题	(247)

论杜甫与道教·····	(260)
“唯识幽难破,因明擘不开”	
——白居易两句逸诗·····	(277)
“不平则鸣”	
——韩愈散文思想性一隅·····	(284)
唐代士人入幕的价值取向·····	(296)
韩维《展江亭海棠》诗的写作地点和主旨·····	(331)
《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感情基调 ·····	(339)
苏轼咏物词考·····	(351)
苏轼咏物词的艺术美与词的诗化·····	(370)
谢翱年谱·····	(402)
 后记·····	 (451)

古代边塞诗探源

——兼谈《诗经》中的战争诗

古代边塞诗起源于何时？文学史家有不同说法。有人说：“边塞诗在六朝与初唐已有制作，如鲍照和陈子昂都有名篇流传”^[1]；有人以为起于隋代，说“从隋代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2]；还有人以为起于乐府古题，就是说起于汉代^[3]。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溯流探源，说中肯綮。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边塞战争和边塞生活为特定表现内容的边塞诗的产生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盛唐是这种诗歌创作繁荣发展时期，但论者说“边塞生活不始自盛唐”^[4]。那么，边塞战争和边塞生活以及反映了这种战争生活的诗篇最早始于何时呢？我们认为，古代边塞诗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应该追溯到《诗经》时代，《诗经》中一些反映战争的诗篇已经具有后世所谓边塞诗基本特征。

古代战争起源很早，按照古代传说，我国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那时各部落间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战争总是在文学艺术上得到反映。“黄帝战蚩尤”、“炎黄陂野大战”等传说便是当时战争在人们观念中经过不自觉的加工后的产物。汉代有鼓吹曲《铙歌十八曲》，蔡邕《礼乐志》云：“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

也,黄帝歧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5]。说军乐起源于黄帝时,跟中国许多古代传说一样,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的论断。刘琨《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6]。这些说明军乐产生时间之早。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歌乐舞是不分的,如果黄帝时已有军乐,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军乐可能还会有简单的歌词,其内容应该是反映战争和军事生活的。但这不过是臆测,不能作为立论的根据。

边界、边境的概念以及边塞战争和边塞生活,应该是和国家同时产生的。“边界”、“边境”都是历史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疆域不是稳定的,统一王朝和分裂时期各政权间的边界、边境就表示着不同的含义。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正式形成。此后经过殷商和两周,我国奴隶制社会延续了一千余年,其间由于中原政权统一国家的出现和周边四夷的存在,区域的划分越来越清晰。《诗·大雅·江汉》中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诗句,反映了周人的边界观念是多么强烈。华夏中原与四夷之间的矛盾始终尖锐突出,相互掠夺和侵犯导致军事冲突,这样边界问题和边境战争也就产生了。禹曾奉舜之命而讨三苗,夏与东夷展开过长期的战争,夏王泄的儿子不降曾讨伐西方的九苑。商朝与四邻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武丁时期,商之四方分布着御方、井方、危方、马方、羌等三十几个方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保存了不少商和方国间发生战争的记录。武丁曾征集一万三千人伐羌。这些战争生活内容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边塞诗。现在保存在《诗经·商颂》的《殷

武》一篇，是祭祀殷高宗武丁的乐曲，其中写到武丁伐荆楚武功：“挾彼殷武，奋发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诗极力渲染了高宗军队的强盛和胜利。《大雅·皇矣》述周开国的历史，其中重点叙述了文王伐密、伐崇之武功。《大雅·大明》是周人赞颂文王、武王扬威克商奄有天下的开国史诗，诗中对牧野之役着力描绘，气势雄壮。这些大概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反映了战争内容的诗。

周王朝建立后，周王朝与周边各族矛盾也十分尖锐。由文献和金文的材料综合研究，学者们认为周对西北二方的外族，主要采取防御政策，所以有“城彼太原”、“城彼朔方”之举，都是建筑北边的要塞。而对于东方和南方的外族则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开拓疆域。周初周公当政至成康之际，是周王朝武功强盛之时，周公东征所取得的胜利，奠定了周王朝立国的基础，成王、康王经营四方，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这期间周王朝在对周边地区用兵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战争在《诗经》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国风·豳风》中的《东山》、《破斧》两篇都是产生在周公东征时的作品。

周衰自夷王之世开始，特别是西周末年，四夷并侵。宣王和幽王的五六十年，是对外战争频繁时期。宣王以中兴之君，即位于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他曾派大将南仲驻守朔方，加强防御，又派尹吉甫进讨玁狁，直至太原。还派方叔南征荆楚，派尹吉甫压服淮夷，先后派秦仲父子征讨西戎，皆以胜利而告终。但是周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外来的威胁，宣王时也遭致一些失败，并在战争中消耗了国力。后来

伐诸戎,均未获胜,特别是千亩之败,全军覆没,王朝实力大大削弱。周幽王即位,社会危机愈来愈严重,最后在申侯联合缙和西夷、犬戎的进攻之下,西周终于灭亡。

在宣王至幽王时期持久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边塞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宣王时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一度“中兴”的气象,曾经引起国人的喜悦和振奋,也引起了诗人们的咏叹和歌唱。外族长期的侵扰,加之周王朝多次遭致失败,特别是幽王时不能有效地抵御敌人的侵扰,这又势必迫使人民饱受征役之苦,产生许多的哀怨,于是反映当时战争生活的诗篇也就产生了,《诗经》中一部分作品是反映这一时期边境地区戍守和征讨战争的。

宣王时期反映周对周边异族战争的诗篇有如下数首:“小雅”中的《采薇》、《出车》、《杕杜》、《六月》、《采芣》诸篇,“大雅”中的《常武》、《江汉》二篇。

先看“小雅”诸篇。《采薇》诗,《诗小序》、朱熹《诗集传》皆以为遣戍役而代其自言之作,姚际恒《诗经通论》则以为“戍役还归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不同意上述说法,以为乃“戍役归者自作”,全诗六章,“其前五章,不过追述出戍之故与在戍之形而已”^[7],就是说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出征战士回忆戍边生活和自己边地感受的。《出车》诗,《诗序》和朱熹都以为乃周王慰劳出征归来将士之词,“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时而为歌以劳之”^[8]。方玉润以为这种说法“似是而实非”,实际上这首诗的作者是“当时征夫”,内容上“以伐玁狁为主脑,西戎为余波,凯还为正意,出征为追述,征夫往来所见为实景,室家思念为虚怀”。

余冠英先生据《后汉书·马融传》中“獯豸侵周，周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载在周诗焉”的话，定为宣王时诗^[9]。《杕杜》，《诗小序》以为“劳还役”，受到方玉润的尖锐批评，以为“儒者说诗，非迂即腐，而又故曲其说以文所短”。方氏以为“此诗本室家思其夫归而未即归之词”，“四章落笔均望征夫之归”，则是从思妇角度反映战争的诗。关于《六月》，方玉润先引述了过去《诗经》学者的各种论断：

孔氏颖达曰：“此经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说王自亲行，下二章说王还之后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谓王伐之，下谓吉甫伐之也。郑以为独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遣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汉》命召公，唯《常武》宣公亲自征耳。’……孙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郑说为长。”

他认为“众论纷纭，皆未尝一读经文也”，他的解释是“盖事本北伐，而诗则作自私燕；王本亲征，而将佐以吉甫；战本同临，追奔则止命元戎”。这是一次宣王亲征而由尹吉甫为将佐的北伐。《采芑》，朱熹认为“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诗以起兴”。方玉润也以为是写“宣王南征”，只是作者不是出征战士，“乃南方诗人得睹方叔军容之盛，知其克成大功，歌以志之”。

再看“大雅”二篇。《江汉》，《诗序》以为此诗为尹吉甫作，美宣王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方玉润以为乃“梦呓”之谈，他